

红旗

H O N G Q I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一九六六年

5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

目 录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任重 (1)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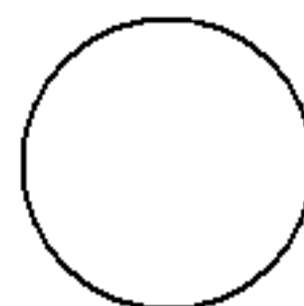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关锋 林杰 (15)

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郑季翘 (34)

工农兵诗选(四首) (53)

☆ 四月五日出版 ☆



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 任 重

同志们：

这次省委召开各县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重点是讨论如何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这个问题，讨论怎样突出政治，怎样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同志们批评省委过去对这方面抓得不够，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各县委的同志检查，说过去对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好，那么，责任首先在省委。省委领导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可以摆一百条、一千条，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突出政治不够。这一条必须坚决改，快改。特别是县以上的领导干部，要努力克服这个缺点、错误。省委已就突出政治的问题发了指示，把突出政治、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我们全年领导工作的第一位。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就是没有突出政治，根本就没有政治挂帅，而是说突出政治不够，政治挂帅不够。同志们在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时候，以从严的精神要求自己，严肃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中有成绩，就原谅自己，忽视我们的缺点、错误，特别是这样重要的缺点、错误。可是，反过来说，也不能夸大。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全面地总结我们的工作。

对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还有不少同志不那么清楚，位置没有摆正，有折中主义以及其他的错误思想。有些同志总是就生产论生产，总是对生产进度、积肥数字等非常感兴趣，而对阶级斗争，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兴趣就不很高。就生产论生产，只看禾苗好坏，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这实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同志是在搞折中主义、实用主义、修正主义。就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认识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包括我个人在内，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够好，政治思想水平不够高，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多一些，辩证法少一些。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盲目性，嗅觉不灵。因此，我们要力求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

现在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讲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一切

突出政治，政治挂帅，政治要统帅一切，而不是别的统帅一切。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一个任意的政策，或随便提出的口号。什么是政治？毛主席给政治下的定义是：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政治。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来就是抓阶级斗争的，从来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一切、统帅一切的。全国解放以前，我们党领导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这当然是政治。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搞土地改革，搞镇压反革命，搞三反、五反，这都是革命，都是政治。从没收官僚资本到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由共产党领导广大工人农民群众进行的。这次革命运动，不仅改变了所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也同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并且在党内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为了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所有这一切，都是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系列的革命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下进行的。

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跃进。那年一月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同志不要做空头政治家，要又红又专。红就是政治好，专就是业务好。毛主席提出要学点业务，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同时又提出不要因为要学点业务，学点技术，就忽视政治，忽视思想工作，变成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要求我们的干部又红又专，以红带专。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①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你忘记了它，忽视了它，是不是就会风平浪静没有斗争了呢？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忽视或忘记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77页。



就会向我们猖狂进攻，阶级敌人就会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腐蚀、侵袭、瓦解我们的党，同时对工人、农民也进行腐蚀和分化瓦解，那就会像毛主席所说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毛主席在他的著作、讲话中无数次地讲过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又讲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开始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现在已经搞了三年了，今后还要继续搞。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直搞到三个差别消灭、共产主义实现为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搞阶级斗争，这就是政治，就是政治挂帅。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仍然是阶级斗争。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发展，是一个新的巨大的贡献。我们突出政治，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保证建成社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如果不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修正主义就要当权，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中国就要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状况。所以，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建设能不能胜利地完成，并且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的保证就是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加以彻底解决。

政治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抓革命、促生产。同志们都经过实践，这都是你们亲身经历过的事，请你们回想一下，是不是每当我们抓革命、抓政治挂帅抓得好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就发展得快、发展得好？凡是不抓政治、不抓革命或者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就搞不好，其他各项工作也搞不好。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在一九五七年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抓两条道路的斗争，搞大鸣大放辩论，整风整党的基础上出现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创造出无数的人间奇迹。正如毛主席在《送瘟神》那首诗中所形容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都是政治挂帅的结果。一九五八年工作中有没有问题呢？也有。由于我们脑子发热，在工作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错误。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讲过：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劳逸结合，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搞强迫命令，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犯错误，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没有认真地、老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真正的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工作中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政治挂帅不够，挂得不好，决不是政治挂帅挂多了

^①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第13期《红旗》。



挂坏的。

我们政治挂帅挂得不好，或者说没有挂起来，最主要的还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这两年。我们这个时期纠正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对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起了好的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会议讨论中，有些人好像认为党的这些政策又可以不要了，这是十分错误的。问题是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们只顾了抓具体政策，抓生产，抓生活，忽视了阶级斗争，忽视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乘机向我们猖狂进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党内，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腐蚀侵袭。那两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抓住阶级斗争，没有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当然，我们口头上也讲过要政治挂帅，要抓阶级斗争。讲是一回事，有没有认真抓是另一回事。我们那时讲过三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阶级路线，坚持技术改革。但是，你那样讲了，并不等于你就没有责任了。你说要三个坚持，怎样坚持呢？反对什么东西呢？没有调查，没有下去蹲点，因此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到，总以为问题不严重。一九六二年秋季，毛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对毛主席的教导体会不深刻，说我们湖北省问题不严重。经过这几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湖北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而是有，并且在一部分地区还相当严重。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仍然要政治挂帅，仍然要抓住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这个主要矛盾，不断革命。

从一九六二年冬天起，我们强调了抓阶级斗争。不过一九六三年抓得不大好，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也抓得不大好，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才抓得比较好一些。但阶级斗争到底严重不严重，这个问题还不能说都已经有了统一的认识。日前就许多同志来说，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这还是主要的。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省一九六二年是增产的，也算是丰收的；可是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这三年是我们解放以来生产发展最快的。这样的增产，在座的同志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呢？这还不是因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抓革命，调动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能不能有这样的结果呢？我看决不可能。

回想历史上，一九五三年我们省的农业生产也有过较快的发展。那一年生产为什么好？还不是因为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搞了三反、五反。一九五四年大水灾。一九五五年情况不好，无非是右倾思想作怪。一九五五年冬天，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抓了农业合作化，反对“小脚女人”，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



条，搞十二年规划，大抓技术改革，又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实践经验证明，毛主席所讲的：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说过去我们犯过错误，走过一些弯路，碰过一些钉子，认识不够，还有许多盲目性，现在，就要通过总结我们的实践经验和我们亲身的体会，来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真理：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必须用政治来统帅一切。

怎样用政治来统帅一切工作

有的同志提出，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用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统帅技术，道理是懂了，但到底怎么做，感到没有办法。提出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首要的问题还是要弄清政治统帅一切的道理，是真懂而不是假懂。只要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具体做法就会在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不少这方面的好经验。不论军队或地方，都有很多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特别是最近报上介绍了河南兰考县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领导群众艰苦奋斗，改变兰考的面貌，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听说大家学习他的事迹时很感动，对照他来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感到自己很不够。这很好，要有这种精神。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党学解放军，学什么呢？就是要学解放军怎么突出政治，做政治思想工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放军有无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活的好榜样，我们要学；地方上工业有大庆，农业有大寨，我们也要认真学。怎么学大庆，怎么学大寨，学它的什么？李雪峰同志对我讲过，大寨的经验归纳起来用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由于有大寨式的党支部，有大寨式的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先进农民），因此才创造了大寨式的先进单位。有的同志在讨论中往往把政治与生产对立起来，好像抓了政治工作，就会放松生产，把政治工作抓好了，生产反而会搞坏。这样看问题是片面的，是形而上学。政治与生产是对立的统一，政治挂帅挂得好，精神就会变物质，生产就会好，而不是相反。我不相信有哪个单位政治思想工作很坏，而集体生产会搞得很好。相反，如果说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很好，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很高，干劲很大，但生产却搞得很坏，我也不相信。你们那个相信有这样的怪事，请拿出一个典型材料来！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到底怎么提法，就农村工作来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三大革命一齐抓。在国家统一计划、统一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寨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这样提、这样做行不行？请同志们考虑。



有些同志争论：到底政治是目的，还是生产是目的？如果说生产是目的，政治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政治是手段，生产是目的，因而政治是为生产服务的。也有的同志说，政治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一般来讲，政治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同时，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把它简化成政治是为生产服务的，生产是目的，政治是手段，那就是错误的。“为生产服务”，为的什么“生产”？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支援世界革命，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我们政治挂帅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经济建设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总而言之，不仅要把我们一国建设好，而且还要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有的同志提出人与物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军队的同志懂得最清楚。毛主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去年林彪同志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十分透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的道理。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由美国人出武器、出钱、出顾问团指挥的飞机加大炮。我们军队少，装备差，却打败了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是革命的人民、革命的军队，政治思想第一，人的因素第一，进行的是革命战争，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越南南方还不是这样？还不是装备差的人民军队、游击队，打败了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南越反动派？古今中外，一切革命战争，无不证实人的因素第一这个普遍真理。当然，打仗也不否定物的因素的作用，如武器、弹药等，但人和物比较起来，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打仗靠人，难道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吗？我们在生产中也并不否定物的因素，没有土地、种子、肥料、耕牛、农具，没有必要的生产资料，怎么能生产呢？但是，要知道，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构成的。生产力本身是人与物的对立的统一，而人的因素是最生动、最积极的因素。在剥削制度下面，劳动者不仅是剥削者的奴隶，同时是生产资料的奴隶。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制或破坏。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动者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普遍真理。同志们都知道不少这样的事例：同样的土地、农具、气候条件，可是，生产的结果却往往大不相同。有的皮棉亩产两百多斤，有的只产几十斤，这不是人的因素第一是什么呢？大庆和大寨的客观条件并不好，可是他们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这不是人的因素第一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政治工作，强调做人的思想工作呢？就是为了要教育农民为革命种田，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种田，为支援世界革命种田，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用社会主义思想，用革命到底的思想来教育农民，向资本主



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就是我们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

干劲怎么鼓法？我们就靠做政治思想工作，再加上关心人民生活，靠这两条来鼓人民的干劲。这两条中那一条更重要呢？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农民为革命种田的觉悟这一条是主要的，应当摆在首位，这就叫政治挂帅。同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社会主义阶段）。也就是毛主席讲的：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在这里，我们和修正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总是讲物质刺激，讲金钱挂帅，根本不讲革命，不讲政治。如果说讲政治，那也是讲修正主义的政治。其结果是使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瓦解，向资本主义倒退。有的同志说，既然讲政治挂帅，好像评工记分、生产队核算、改善人民生活都可以不要了，这是误解，是错误的。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干什么？生产还有一个目的嘛！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那里呢？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使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机器的主人。他们是为自己生产，又是为集体生产，为国家生产，为支援世界革命生产。我们党的方针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分配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只有正确执行这些政策，才能使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更加清楚地看到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才能调动群众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对立的统一，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千万不可片面理解。

劲可鼓而不可泄。问题是鼓什么样的干劲。要鼓正确的干劲，不能鼓错误的干劲，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鼓干劲，要善于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当然，没有革命热情，满足现状、甘居中游或者落后自满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求实精神的。焦裕禄同志满腔革命热情地来探求兰考县的实际，看兰考县的“三害”是怎么造成的，通过调查研究，提出正确的措施，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向“三害”作斗争，努力改变兰考的面貌。我们像焦裕禄同志这样做，就是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不这样做，就可能是个人主义挂帅。一个党有一个什么挂帅的问题，一个人也有什么挂帅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我们一个党、一个领导机关、一个人，不受这种思想支配，就要受那种思想支配。这回大家不是也对比了吗？我们湖北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县、区、公社、大队，也有一批比较落后的县、区、公社、大队。事物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种状态，这是必然的。但我们要做工作，总要不断地改变它，要使先进的更先进，使中间的向先进看齐，使落后的改变面貌，赶上去。为什么有些地区先进，为什么有些地区老落后？同志们可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我看，是不是政治挂了帅，挂得好不好，搞没搞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条主要原因。凡是那些落后的地区，多半是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的地方，再就是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缺乏



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省委一九五九年提出“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的口号，强调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后来，我们在有些地方改得不适当，犯了一些错误。所以，一九六〇年省委总结经验教训时加了一句：“乱改就减产”。这样就全面了。实践证明：凡是正确地认识了大跃进中的成绩和错误，正确地接受了经验教训，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真正按照这四句话去做的，这几年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就很快；凡是不这样搞，怕字当头，稳字当脚，不敢改革，甚至把改得对的也放弃了，良种也不要了，条播也不搞了，水利也不办了，这样的地方就进步很小，或者没有进步，甚至倒退。当然，对落后地区我们省委有责任，帮助不够。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着急，也不要泄气。要振作起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要按毛主席指示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扎扎实实地搞上去。

省委再三讲，省、地、县各级党委，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突出政治，狠抓政治思想工作，少抓生产中的具体事情。生产环节，分机器、分化肥，要交给业务部门去搞。我特别强调了，对于那些生产进度、积肥数字等等，希望你们这一辈子都不要感兴趣。有些同志对我这个说法误会了，说：你这一讲，我们县委就不要抓生产了。谁说县委不要抓生产呢？不是说要又红又专，要学点业务，学点科学吗？我们领导农业生产，就要学点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我那样讲，是要我们党委的负责同志多抓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少抓一些日常的生产、业务、技术等工作，少搞一些事务主义，而不是说要县委不要抓生产，不领导生产。我们要三大革命一齐抓，县委怎么能不抓生产呢？焦裕禄同志不是抓了生产吗？要像他那样抓生产中的大问题，不是抓小问题。县委书记不要代替“生产队长”。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搞生产，又搞科学实验。今后我们办点、蹲点，一律要这样做。

党委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抓些什么呢？我看讲多了也抓不了，就是抓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五个不可忘记，即：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党委今年抓，明年抓，永远要抓住这五个不可忘记，这就做到政治挂帅了。党委经常抓这五个方面的工作，讨论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检查这五个方面的工作。我看只要这五个方面抓好了，就能调动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保险生产一定搞得很好。这五个方面抓不好，就是天天讨论生产问题，生产也搞不好。

具体到下边怎么抓法，过去做得不够好，你们作检讨，我们也要作检讨。今后下去检查工作，发现哪个队生产搞得不好，是落后队，首先就要问生产为什么没有搞好？要向党支部作调查，向贫农、下中农作调查，看看这个地区阶级斗争是什么样，干部、党员的思想作风是什么样，贫农、下中农有什么生活问题、思想问题。从这些方面着眼去找生产落后的



原因，而不是就生产论生产。首先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或者领导是否关心群众生活上去找原因，还要从政策上找原因，看政策上有哪些规定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找到原因，加以解决，生产落后的面貌就可以改变。至于说还有没有生产上、技术上的问题？也会有的，一般来讲，这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只要把上面这五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了，生产、技术落后的问题让干部、群众去讨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脱离了干部、贫农、下中农的思想问题，就生产论生产，不抓活思想，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不关心贫农、下中农的生活疾苦，即使是发现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生产技术上同样存在着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只有通过说服、讨论、试验，把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解决了，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

会议上讨论了“五好”和比学赶帮超的问题。要广泛开展这个运动，搞个开门红，又要红到底！口号是不是可以这样提：“五好为目标，比学赶帮超”。开展这个运动，一帮一，一对红，一面红旗带一片，百面红旗带全县。先进单位对比较落后的单位要帮，你赶我，我帮你，希望你超过我。比什么，学什么，赶什么，帮什么，超什么，都以五好为目标。谁先进，谁落后，都以五好为标准。五好当中政治思想好是第一个条件。不要把增产多少或单产高低，作为第一条。这样搞，就把政治思想工作，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三大革命，一齐抓起来了，而不是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把一个一个问题孤立起来。

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及现在世界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期，革命就得到发展，走向胜利；凡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挂帅的时期，革命就遭受挫折，遭到失败。解放十几年来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项工作，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好的，工作就好；凡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差的，工作就差；凡是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就必然走上邪路。所谓政治挂帅，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要把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培养革命接班人等联系起来看。这些都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就是空喊政治挂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在国内进行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我们观察和处理世界革命问题的指南。应当怎样看国内的问题，看世界的问题，认识国际形势？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进行分析和判断，不然就不会有正确的



认识。现在世界上阶级关系、阶级力量正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正在搞反华大合唱。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表面强大，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实际上非常虚弱，都是垂死的东西。要记住：敌人反对我们、骂我们，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越骂得凶，越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革命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修正主义分子不骂我们，奉承我们，叫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同他们差不多，成为修正主义或者半修正主义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越骂我们，就越暴露他们自己。他们的人民会想一想，为什么要骂中国，中国是好是坏？可以提高人民的觉悟。现在美帝国主义把全球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矛头对准我们。好，这就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不革命了，而且反对别人革命，做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一心想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我看这也是做梦。帝国主义内部还有矛盾，它同现代修正主义就能合作得好？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乱子，都不要惊慌。要相信人民。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要革命的，他们有的已经起来斗争，有的迟早要起来斗争。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迟早要灭亡，他们的寿命是不会很长的。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客观形势的发展，还将再三证明是对的。当然，世界革命也和我们中国革命一样，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会遭到一些挫折，甚至严重的挫折。但是，最后总是要胜利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社会发展规律。不坚定地相信这个真理，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学习毛主席著作，怎么学？怎么用？就是林彪同志讲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有些同志讲，不知道带什么问题学，学了也不会用。我个人是不是就会了呢？不能这样讲。是不是完全不会？也不是。究竟带着什么问题学？学了怎么用？用它干什么？根据我个人的见解，归纳起来，是要带着两方面的问题学，在两方面用。即：带着思想上的问题学，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用来改造思想，用来改进工作。改造思想，不仅是改造别人的思想，而且首要的是要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打铁先要本身硬”。光改造别人的思想，不首先改造自己的思想，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那样的思想工作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脑子里经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人要每天洗脸、扫地、打扫灰尘。改造思想是一辈子的事情。帝国主义分子诬蔑我们改造思想是“洗脑筋”。洗脑筋有什么不好？思想上有脏东西，就要把它洗掉，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洗掉。坏思想不去，好思想不来，这也是对立的统一，不破不立。

改造思想，改什么？就是毛主席讲的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改造资产阶级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方法论也是世界观，分开讲，也可以，实际上是分不开的。要教育我们所有的干部、党员，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该具备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或者叫宇宙观。世界观问题是根本问题，是立场、观点问题。每个同志都要懂得，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都要兴无灭资，要经常注意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要帮助别的同志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让这两种思想“和平共处”。毛主席讲，没有党内斗争，我们党的生命就会完结。一个人的思想没有斗争，就等于思想停止了，死亡了。不前进就会后退，不是逐步走向彻底无产阶级化，就会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成资产阶级化。“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的思想变化就是如此。

什么叫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所谓无产阶级思想，就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无非是放大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兴无灭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想解决方法论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方法论的问题就不重要了，或者方法论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在实际工作中，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就是方法论的问题；动机好，方法不对，还是达不到目的。毛主席强调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就是鉴于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多了，辩证法少了，我们的工作方法就会出现烦琐哲学。一个案子写多少万字的材料，统计表报搞那么多。有的同志提出“会议多、文件多、表报多”。我们接受批评，我们省委要改，你们也要顶，不该填的表报一律不填。有的人不发表格，发调查提纲，结果比统计表还复杂，你们也不填就是了。对于“五多”，要采取各种办法抵制。

要解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就要学习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特别要学好《矛盾论》。不是提倡唯物辩证法吗？《矛盾论》是写辩证法写得最好、最全面、最系统的一篇文章。真正把《矛盾论》读通了，就真懂了辩证法；多懂一些《矛盾论》，就多懂得一些辩证法；不懂《矛盾论》，就不懂辩证法。

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我提议同志们很好地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三篇文章。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论述，也要好好学习。特别是省、地、县三级党委，要通过学习，检查工作，改进领导，一定要有具体措施，要有实效。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也是各级党委的根本工作方法。



总之，要带着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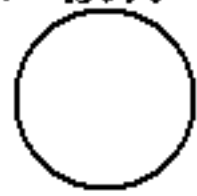
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学，怎么学？举个例子来讲。

毛主席一再强调两点论、两分法、一分为二。毛主席这样教导我们，同志们看事看人是否都学会了两分法？讲成绩就忘掉缺点、错误，讲到缺点、错误又看不到成绩；讲到困难看不到光明，讲到光明又看不到困难，这就不是两分法，而是形而上学。我们过去犯过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今后也还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了就要马上纠正。难道这也很难吗？贫农、下中农对农村工作中的许多问题，都会用两分法来分析，政治水平相当高。相反，我们有些工作人员，同贫农、下中农比起来，政治水平却不如他们，对问题看不清楚，又自以为是，不肯听取群众意见。这就不能不犯错误，碰钉子。因此我们要提高自觉性，努力学会用两分法去看人看事，力求减少盲目性、片面性。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工农兵学习。无疑，我们党、我们的领导干部，有责任向工农兵进行教育，向他们作政治思想工作。而为了做他们的工作，首先就要向他们学习。现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都在学毛主席著作，有些积极分子学得很好，用得很好，写的文章也很好，那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写不出来的。毛主席再三教导我们，不要迷信教授，不要迷信伟人、作家、哲学家，有些所谓出名的“哲学家”，往往不懂哲学，是假哲学家。毛主席提倡哲学要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毛主席讲，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有真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走。北京市的挑粪工人时传祥同志，不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吗！我们要老老实实向工农兵学习。我参观过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的展览会，受到了教育。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来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兴无灭资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多快好省地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巨大动力！

有的同志讲，文化低，学不到，用不到。这不是理由。不识字也可以学，可以听别人读，不懂就问别人。既学毛主席著作，又学文化。有的同志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同自己的工作思想联系不起来。那要看你是不是真正下了功夫。只要下决心，有高度的革命热情，有高度的阶级感情，去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哪个人学不到、用不到。只能说有人学得快点、多点，用得差点。有人学得慢点、少点，用得差点。这样的差别是有的。根本学不到、用不到的事是没有的，除非是懒汉，根本不想学，那就没法了。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学生的一封信。她说：思想上的问题和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在毛主席著作中找不到解答的。这是一个中学生说的话，我认为是真理。中国乒乓球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赢得世界冠军。《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一篇讲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吗？没有。可是徐寅生同志却从毛主席著作



中找到了武器，写了一篇怎样打乒乓球的好文章。徐寅生同志二十多岁，我们在座的同志大都在三十岁以上，有的四十、五十了，再不学就要落后了。所以，同志们为了革命，要用满腔热情学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学了就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要付出艰巨的劳动。要做到老学到老。要革命到底，就要学毛主席著作到底。我们每个同志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好宣传员。这是我们的义务。不论工农兵、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都是革命战士。为革命工作，为革命奋斗一生，要立场坚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要当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处处以身作则，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谈话、在家里、在外面、和贫农、下中农谈心，都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像雷锋、王杰那样，不仅用嘴巴宣传，而且要用行动来宣传。身教重于言教。同志们！我们要求你们这样做，也希望你们监督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哪些做得不够，做得不对，就请你们批评。



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今年向大家介绍过孝感县委八个字的工作方法。他们的八个字是“值班、蹲点、劳动、学习”。值班，就是说，县、区、公社直到大队支部、贫协、大队长、副大队长，各级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成员轮流值班，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不值班的，就下去蹲点。蹲点要参加劳动，不仅仅是为劳动而劳动，而是要通过参加劳动，进行群众工作，进行科学试验，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学习，在家值班要学习，蹲点的带着毛主席著作下去，一样要学习，还要参加群众学习，领导群众学习。后来，我们又在这八个字上帮他们加了两个字：民主，成为十个字。民主，就是说办一切事都要发扬民主，先民主，再集中。下去蹲点，不要站在群众头上指手划脚，要同群众商量办事。哪些事要办，哪些事不办，哪些事先办，哪些事后办，都要同群众商量，同贫农、下中农、基层干部商量。要真正地商量，先听群众的意见，再发表自己的看法，群众有不同的意见，要反复酝酿，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一去就当先生。党委会一定要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准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以上十个字——“值班、蹲点、劳动、学习、民主”，建议各县也都照着办，大家看行不行？

有的同志提出，从实际出发有时候与执行上级指示有矛盾，怎么办？办法：第一是可以暂缓执行，第二是立即向上级报告。至于有些小事，例如什么时候下秧、什么时候积肥等，上面本来不该管的，却硬要管，出的主意又与下面实际情况不符合，下面可以不执行，也不必报告。这不算无组织无纪律。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要向上面报告，一直可以报到省，报



到中央。同志们，民主是个大问题，没有民主，一个人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群众路线？我们工作中犯错误，除了没有认真领会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之外，我认为主要的还在于两条：一条是没有蹲点，再一条就是民主不够。如果有这两条，就可以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发现和纠正得更早、更快一些。蹲点和民主搞得更好一些，了解实际情况多一些，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林彪同志提倡吃透两头，看来不吃透“下头”，就难以吃透“上头”，反之，亦然。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不经过实践，不碰钉子，往往不能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现在我们照上面的十个字办，努力做到“吃透两头”，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工作方法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县委怎样更好地实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县委的具体事可多了，那么多的部门都要来找，要处理日常工作，还要蹲点，还要劳动、学习……。如果一个县委书记不能比较闲一点，有一点时间看书，作调查研究，同下面干部和贫农、下中农谈心，想问题，就是辛苦忙碌到浑身是病，工作也还是搞不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改进县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可以分几条战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分头负责。该分给业务部门办的事，就交给业务部门负责去办。县委领导干部，轮流值班。县委书记管总的，除了主持县委会议、抓学习以外，就是下乡蹲点，还可以抽时间跑一跑面，不要老在家里坐办公室。你们看这样办行不行？

“这一边不放心，那一边害怕。”县委书记自己不直接抓生产业务，让别人抓，总不放心；分工管生产的同志也有点怕，怕抓不好。我看，你当书记的也不要不放心，负责管生产的同志也不要害怕。只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就不会把事情办坏。就是出点毛病，也不要怕。同志们要懂得，具体事情错一百件，无伤大体，大政方针（例如思想政治工作或生产上的重大措施）只要错一件，就会全盘被动。不抓大政方针，天天打杂、催耕、催种、催收、催交，结果工作还是搞不好啊。再者，具体事情的处理，并不是件件都能联系到重大原则上面去的。有些具体事可以这样处理，也可以那样处理，分工负责的同志就要大胆负责。处理错了，改过来就行。我们对各部门的同志讲过，大事情要请示报告，日常事情你们大胆处理，办错了，省委替你们担担子。

总之，要搞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必须实行毛主席说的八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按照这八句话去办，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今天我讲的没有哪一个是新鲜问题，用湖北人的说法就是“炒现饭”。现饭也不坏，加点油、盐一炒，蛮好吃嘛！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挂帅，学习毛主席著作，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过我加的油、盐不多，现饭不一定炒得好吃，好在会议还有几天，有什么意见，大家还是敞开思想谈。不要因为我讲了，你们就不讲了。还要讲，特别是要批评省委领导的缺点、错误。我讲得不对，你们就批评，我就改正。



《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关 锋 林 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①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要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驳

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页。

② 载1965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〇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在《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在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二篇文章，即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



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称海瑞”；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四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一九六〇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

史上的改良主义（按：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晚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他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代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①。

（四）吴晗同志说：“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见吴晗《谈历史剧》。此文发表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据吴晗同志自己说：《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他说：“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吴晗同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

^① 《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1961年2月18日《北京晚报》。



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又说：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六) 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论历史剧》。他说：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 一九六一年《戏剧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五月十八日吴晗同志作答）。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他说：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又说：“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 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指桑骂槐’。”^①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

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出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繁星说：《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②。史优（即孟超）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③。方三也说：《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④。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新途径”^⑤。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

① 《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灯下集》，第141、143页。

② 《“史”和“戏”》。1961年2月16日《北京晚报》。

③ 《也谈历史剧》。1961年3月17日《北京晚报》。

④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1961年3月11日《北京日报》。

⑤ 《评〈海瑞罢官〉》。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①，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

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二) 《海瑞骂皇帝》 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②单取一个“骂”字。吴晗同志究竟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

^① 见时汉人发表于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② 见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像《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熜有不少批评；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他首先歌颂朱厚熜“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继而又替朱厚熜辩解，说“格非而归

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这一点，连朱厚熜也是清楚的。朱厚熜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①又秘密地对徐阶说：“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②朱厚熜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③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熜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明史》本传记载：“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饌款之。瑞白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噉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他说：“噫！到此

① 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见《海瑞集》，第540页。

② 谈迁：《国榷》卷64。

③ 见《海瑞集》，第222页。



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熜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一九五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一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

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茬口。有的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

吴文：“你比汉文帝怎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太有出入。“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吴晗同志则写作“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像话。《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误，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挠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己



拒谏，执陛下—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这段话的大意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挠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抓住陛下—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吴晗同志竟斩头去尾，挖取“是已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一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全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向来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吴晗同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样记载的。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查对，而要绝对地相信。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

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海瑞骂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旧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阶级斗



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对于这出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出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海瑞上疏》的编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①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说，丁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出一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晗同志也是这样。吴晗同志自己说过：“写这个

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用”。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②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

① 丁学雷：《〈海瑞上疏〉为谁效劳》。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

② 《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以下引自《海瑞罢官》的话，不另注出。



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地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海瑞“把皇上骂苦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到皇上驾崩，才被赦出狱”。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剧情越向前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又对海瑞说：“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第七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乌纱帽吗？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

纱帽！喏！喏！（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归田。……（唱）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人“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二，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通过“海瑞”唱出：“海瑞罢官姓名香”；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诗。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三，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这里喊出了：“海青天回来吧！”

第四，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



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同戴凤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足够威风的了。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脑子一转，计上心来：要杀他几个再走；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不是更有戏吗？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他说：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方三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①。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

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明友，泰然举起官印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而止。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②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③。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

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④。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

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替吴晗同志辩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封建法律以严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

① 《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1961年3月11日《北京日报》。

② 邓允建：《评〈海瑞罢官〉》。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③ 曲六乙：《盖为甘草剂，敢作南包公》。1961年第3期《北京文艺》。

④ 《谈历史剧》。1960年12月25日《文汇报》。



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徐阶属于“八议”之列。按明律规定：“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①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海瑞杀死徐瑛，从史实上讲，没有；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当时吏部批复戴凤翔的疏说：“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②海瑞自己也说：“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日今疾气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愈，衰弱为甚”，“恳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③。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别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他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一九六〇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么？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么？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 八议，即规定有八种人犯了法，须由大臣评议，经皇帝批准，减轻罪等。这八种人是：“亲”、“故”、“功”、“贤”、“能”、“勤”、“贵”、“宾”。亲，指皇帝的亲族；故，指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指有德行的（符合地主阶级道德规范的）官吏；能，指地主阶级有“才能”的官吏；功，指对封建王朝有功勋的官吏；勤，指忧勤地主阶级国事的大臣；贵，指官高爵厚的地主阶级分子，明律规定，三品以上的文武职事官都属于贵；宾，指前代帝王的子孙。总之，八种人都是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他们在法律上享受特权。

① 《明律集解》附例，卷1。

② 黄秉石：《海忠介公传》。见《海瑞集》，第567页。

③ 《告养病疏》。《海瑞集》，第241页。



(二) 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

这是故弄玄虚。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

吴晗同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但是，剧本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退職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

胜利了，没有“罢官”。写这段故事不行吗？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力图翻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说穿了，《海瑞罢官》是：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

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

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 戳破吴晗同志的 “护身符”——《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九月十七日。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摇旗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

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一) 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比较隐蔽了）所谓敢骂的“海瑞精神”。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仍然本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

把《治安疏》中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已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 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全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 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如说：“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任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又说：“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不是。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呢？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



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 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像《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例如，他说：“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所没有预料到的”；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这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请问：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

“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是的，这话说过；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吴晗同志没有说，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封建秩序；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

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骂”，有“罢”，有“反乡愿”（这一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出的）。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海瑞罢官》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



《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

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①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说：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了；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因此，周先生叹息说：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证明：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

① 见1966年1月7日《文汇报》。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第482页。



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会还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

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①。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

^① 见1959年第17期《红旗》。



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

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



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试问：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吴晗同志的“巧言善辩”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①。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一、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三、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

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 * *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① 见《学习集》，第273页。



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

郑季翘

编者按：郑季翘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对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对于“形象思维”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现在发表出来，欢迎大家进行讨论。

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又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我们相信，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也一定会有好处的。

一、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流行着一个特殊的理论，这就是形象思维论。这个理论很有势力：一些文艺理论家在倡导着它，大学的文学课程在讲述着它，文艺工作者在谈论着它；一句话，这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普遍流行的、用以说明作家进行文艺创作时思维过程的基本理论。这个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宣称：党不应该“干涉”文艺创作，因为党委是运用

逻辑思维的，而他们这些特殊人物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被一些同志奉为金科玉律的形象思维论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文艺创作的特质果真在于“形象思维”吗？这个被某些人祭在空中，借以唬人的“法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经过研究，才知道：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近年以来，文艺领域中不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反映了这个战线上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形象思维论，却正给一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人们提供了



认识论的“根据”，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特殊的理论，无益于作家创作，相反，正是它，迷悞了许多作家。

当前，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在文艺领域中，我们正在对一些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理论进行斗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彻底破除形象思维论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体系，那就等于还给反社会主义的文艺在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留下一个掩蔽的堡垒。所以，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对形象思维论进行彻底的批判，扫清形象思维论者散播的迷雾，应该是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上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二、形象思维论的基本观点

什么是形象思维？论者一致主张：它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而为作家艺术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现在根据看到的几种著作，将其论点引述如下：

以群同志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高等学校试用教材）说：

“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而说的。”^①

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著的《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说：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就有所不同。一般把

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以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②

蒋孔阳同志在他的《论文学艺术的特征》的小册子里说：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对称的。它们都是我们人类的思想活动，为了适应不同的实践需要，而后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掌握和认识客观现实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主要是指科学家为了掌握客观事物间的关系，发现和制定有关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律，然后所产生出来的一种逻辑的推理的思维方式。至于形象思维，……它是作家和艺术家为了构造艺术形象的要求，而后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③

那么，形象思维是不是指人的感性认识而言的呢？又不是。形象思维论者一致指出，形象思维也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是认识的理性阶段。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说：

“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作家的形象思维和科学家的抽象思维一样，都必须遵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④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说：

^{①④}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221页。

^③ 《论文学艺术的特征》，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都是人们通过实践在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都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①。

李泽厚同志在其《试论形象思维》的论文中说：

“思维，不管是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都是认识的一种深化，是人的认识的理性阶段。”^②

蒋孔阳同志说：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我们的认识逐渐由现象向本质的深入，都在于揭示现实生活的规律性。”^③

霍松林同志在其编著的《文艺学概论》中说：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以‘感觉材料’为依据，同时都要概括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的联系和关系”^④。

形象思维既然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是“认识的理性阶段”，那么，它是怎样从感性发展到理性的呢？它既然是和逻辑思维“对称”的，那么，它与逻辑思维的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说：

“它们不同的地方是在于，一个是凭借形象、一个是凭借概念进行形式不同的思维”^⑤。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指出：

形象思维的特点和“精义”在于“在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

维”^⑥。

蒋孔阳同志说：

“如果说逻辑思维从个别和具体，上升到一般和抽象，以达到纯粹的本质的东西。那末，对于形象思维来说，它始终是个别的和具体的，它虽然也深刻地反映着现实生活的本质规律”；“比较起来，形象思维就不是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概念，而是就通过现实生活本身的形式来进行构思。”^⑦

李泽厚同志说：

“形象思维是个性化与本质化的同时进行。这就是恩格斯称赞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典型的创造。形象思维的过程就是典型化的过程。”^⑧

霍松林同志说：

“总之，形象思维是用形象来思维的。”^⑨

总括起来，所谓属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又和逻辑思维对称的形象思维，就是不用抽象、不用概念、不依逻辑规律，而是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能进行思维吗？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吗？

形象思维论者答道：这种形象思维妙得

①⑤ 《文艺学新论（修订本）》，第221—222、222页。

②⑧ 《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第104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③⑦ 《论文学艺术的特征》，第56、68、70页。

④⑨ 《文艺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0页。

⑥ 《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第190页。



很，它比逻辑思维要高明：“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在形象的思维上达到了的，并不一定就同时能够在逻辑的思维上达到。”^①而且“正由于这两种思维规律的不同，……因而某些作家的世界观虽有着落后因素，但有可能突破其世界观的局限而达到真实的反映生活。”^②

这种形象思维论难道符合毛泽东同志阐明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吗？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是这样说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所以理性认识即理论的（逻辑的）认识“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③

显然，所谓形象思维论，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点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再引霍松林同志的一段话：

“有些人认为不论是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改造制作’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逻辑思维是从具体到抽象，‘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形象思维也是从具体到抽象，形成抽象的主题思想。在他们看来，形象思维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只是它在形成抽象的主题思想之后，还需要给这种抽象的主题思想制造形象的外衣。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是有很大的危害性的。按照这种说法，必然会在创作的一定阶段上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其结果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④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在文艺领域中运用《实践论》中所阐述的普遍的认识规律，竟然达到如此狂妄的地步！

三、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的所谓形象思维是根本不存在的

形象思维论者把所谓形象思维说得神乎其神；但是，只要我们破除迷信，剥去形象思维论用以装饰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分析它的本质，就不难发现：这种所谓理论不过是一种违反常识，背离实际的胡编乱造而已。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文艺家用概念来思维，而要他们用形象来思维，这不能不使人惊奇。大家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⑤斯大林说：“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

① 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1956年第9号《文艺报》，第35页。

② 周勃：《略谈形象思维》。1956年8月号《长江文艺》，第4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0、279页。

④ 《文艺学概论》，第8—9页。

⑤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5页。



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语言是由词组成的。概念就寓于词之中。列宁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②可见，不用概念的思维，是不存在的。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作家在思维中运用抽象，要求作家在整个思维过程中永远不离开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不离开形象的整体。这是一个极端荒谬的论点。抽象，就是抽去具体事物的非本质现象，摄取其本质的一种思维活动。世界上整体相同的事物，就只有这个事物本身，所以，人们如果不利用抽象，就不能将两件事物联系起来，就不能找出各种事物的共同性，就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达到理性认识。概念，就是经过抽象才形成的。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③。显然，要思维，要发现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运用抽象的方法。没有抽象就根本不可能有思维。形象思维论把“不经过抽象”作为形象思维的特点，这正是这个“理论”的最根本的错误。这里，应该说清楚：我们反对的是形象思维论，并不是反对文艺的形象性；我们说思维必须运用抽象，并不是说作品应该抽象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阐述。

形象思维论者虽然声称形象思维也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但他们既然反对作家在

文艺创作中运用逻辑思维，实际上就是在文艺创作中取消思维，反对理性；因为认识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抽象，运用概念，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才能达到的。思维中运用抽象，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就必须遵循逻辑规律。必须说明，我们所说的逻辑是指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两者而言的。思维所以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正是因为它所遵循的逻辑规律乃是客观事物最根本、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的反映。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④又说：“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⑤正因为这样，依照逻辑规律进行思维，就可以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取得正确的理解。可见，要发现事物的本质，不是谁愿意不愿意在思维中遵循逻辑规律的问题，而是必须遵循逻辑规律的问题。

有些形象思维论者似乎感到了他们的理论的危机，想尽办法在暗中给这个理论修修补补，说作家在创作时也需要点抽象思维，

①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7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3页。

③④⑤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4、89—90、192页。



作为形象思维的助手；有的并且利用辩证法的形式，说：“否认形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会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反过来，否认抽象思维在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可能削弱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在形象思维论者想来：这样把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列成矛盾的两个方面，又把形象思维当作矛盾的主导方面，真是稳妥和保险不过的事情。但是，形象思维论者想用这种办法维持一个假道理，是枉然的。折中主义的诡辩并不等于辩证法。我们且问：在这里，那起主要作用的所谓形象思维，还是不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如果是的，那就还和过去一样，在达到理性认识的途径上，制造了二元论，实际上反对了《实践论》；如果说，作品形象的思想意义是抽象的思维赋予它的，那就等于自动宣布形象思维论的破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形象思维论者的思想是极端混乱的。

为了论证不经抽象、“从个别到个别、从具体到具体”的形象思维也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形象思维论者发明了一个“合二而一”的公式：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他们说，这就是形象思维的特征。

必须指出，形象思维论的这个论点，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修改。马克思在讲到人的认识和思维过程时说：“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恩格斯说：“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完全在于我们在思维中能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提高到特殊、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一般”^②。列宁说：“为了要

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③毛泽东同志谈到人们对于特殊和一般的认识的关系时，指出：“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④显然，形象思维论者的“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的论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个认识的阶段论的。

为了给这种荒谬的臆造编制论据，形象思维论者硬说文艺创作中典型化的过程，就是“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大家知道，典型是一类事物的完备的或最完备的形态。在现实事物中，不体现本质（共性）的个性和不为个性所体现的本质，都是没有的。所以，典型不能不是本质和个性的统一体。但文艺作品的典型，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典型，因而什么是这个典型人物的本质和他的个性特征，作家对它必须是自觉的，他才能够掌握和创造这个典型。为此，作家必须把他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个性不同的许多人物加以分析、比

①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1页。

②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5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1页。

④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8页。



较，取得对于各个阶级中各类人物的各种共性(本质)的认识；又必须根据“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原则，依据人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对典型人物体现其共性的个性，取得明确的认识；才能根据这种认识进行创造，把取自现实人物的与自己的思想意图相适应的某些表象材料加以集中，使个性与共性统一起来，创造出各个阶级的各种典型。这样，人们才能通过这个典型，认识到某种人物的本质，它才能具有认识的意义。可见，作家在创造典型时，他的思维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认识规律进行的，而不是什么“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的浑沌一片。

形象思维论者反对抽象，主张作家用形象来思维，要个性化与本质化同时进行等等，就是反对创作时有主题思想，有思想指导。有些形象思维论者并不隐讳这一点。霍松林同志说：“在形象思维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化和具体化是统一的，不应该先抽象出赤裸裸的‘主题思想’然后再将它具体化。”^①有的人则说：“作品的主题，是作品写成后，由批评家给分析出来的。”必须指出，这种不要先有主题思想的文艺创作论，在不久以前，在不少文艺工作者当中，还是一种时髦的理论哩！

实际上，这是一种空论。人类的一个特点，是有自觉的能动性。无论做什么事情，预先总要有个目的，有个安排；纵然这个目的和安排还是粗略的，但总须要有，才能动手去做。作家没有个主题思想，就不知从何写起。当然，人的认识总是从感性的东西开始，作品的主题思想属于作家的理性认识，

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来，主题思想总是作家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结果。由于人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发展和改变原来的主题思想的事也是常有的。但不论怎样，作家总是在主题思想(原来的或新的主题思想)的统帅下写作的。艺术实践表明：主题思想不仅通过作品的具体情节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而且有时作者还在作品中用一定的方式直接加以表白。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开头《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等回目中，就表出了本书的主旨。《水浒传》作者，则在《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回中，通过对梁山好汉的赞辞，道出了他贯串于全书的指导思想。托尔斯泰对俄法战争的历史宿命论观点，在《战争与和平》一书里，不仅体现于一些人物形象中，而且还以作者插话的形式，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即使是自然主义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社会现象，也是经过他自己的选择的；而任何选择，都是在人的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总之，作家创作，都是为了表达来自实践的—定的思想意图；而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总的思想意图，就是主题思想。至于和作家时代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思想水平和生活经验不同的读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概括和认识作品形象的意义，得出和作者意图不完全相同的结论，这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得到说明，并不能为否定主题

^① 《文艺学概论》，第10页。



的形象思维论者提供任何根据。

至于说到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过去有，今后还会有，是必须加以反对的。但是必须正确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克服它。产生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这是由于作者缺乏社会实践，没有取得丰富的原始材料，更说不上在这些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性认识。他只是从别人口中或书本上得来了一些概念，又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加以体验和检证。这样，他就无法使这概念和活生生的事物联系起来，因而也就无法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形象。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这个作者头脑中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恰恰是因为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办事。公式化概念化作品产生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作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低，思想简单化；有时即使积累了一些生活体验，也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复杂的生活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从中引出其固有的含义，而常常是把这些丰富生动的生活素材削足适履地纳入某些现成的公式里。可见，文艺作家要想真正地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就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地深入工农兵，参加实际斗争，而不是按照形象思维论者的指导，在思维中排斥抽象，弃绝概念，回到动物状态去！

排除了理性，乞灵于感情，并且把感情神秘化，这是许多形象思维论者的共同主张，而李泽厚同志则说得更加露骨。他要作家依

靠“正确的情”——“美感感情”——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大家知道，文学理论中的“唯感情论”，本来是资产阶级神秘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一个基础，形象思维论者却把它当作了宝贝。李泽厚同志公然搬出了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则更认为艺术的本质和使命就在于传达感情；把作者的感情传给读者；上一代的传给下一代……。其他英、法、德国许多美学家也有与此相同或近似的论点。所以，不仅是像诗歌、音乐、舞蹈……这些更直接表现感情的艺术（所谓‘表现性’强的艺术）是如此，就如小说、绘画、雕刻以至建筑、工艺等（所谓‘造型性’强的艺术），也是如此。”^①形象思维论者就这样公然宣布了自己是托尔斯泰的门徒，是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美学家的崇拜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形象思维论和有些人鼓吹的资产阶级美学的“使情成体论”是一类货色！

应当弄清楚感情和理性的关系。大家知道，人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事物，有一些事物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和社会要求的，另一些事物则相反；于是人们就依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及其与自己的关系，而决定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态度：肯定它或者否定它。人们对于被肯定的事物发生满意、愉快、喜悦、热爱之类的感情，而对于被否定的事物则发生不满、愁闷、悲伤、痛恨之类的感情。毛泽东同志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① 《试论形象思维》。1959年第2期《文学评论》，第107—108页。



恨。”^①和形象思维论者所说的恰恰相反，人们不是凭感情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决定着人们的感情。所谓美感感情，是人们的感情的一种，也必然是这样。

人的某种感情在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以后，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固定性，当引起这种感情的类似事物一旦出现，人们就会发生类似的感情反应。但是，这种迅速的感情反应，很可能是不对的。例如有人见到某种事或听了某种话，勃然大怒；但当他想了一想，即经过深入的考虑之后，他的气消了，有时还可能转而高兴或感激起来，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很复杂，而且是不断变化的；类似的客观事物，出现在不同的条件下，常常具有着不同的意义，包含着不同的性质。而认识这种意义和性质，感情是无能为力的，必须深思熟虑，重新作出判断，才能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态度。感情总是由理性制约的。

人的感情对人的实践起着巨大的影响。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任何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劳动的创造，不仅是在一定的思想的统帅之下进行的，而且也是在一定的感情推动之下进行和完成的。作家是这样，科学家、革命的政治家等等都是这样。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②但是，这种感情必须是基于深刻的理性认识的深厚的感情，那种不是基于深刻的理性认识的一时的感情，即使当时表现得十分强烈，也只能是一种易逝的冲动，不可能成为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推动力，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作家创作的推动力。

作家必须以其洋溢在作品中的激情来感动读者。托尔斯泰认为艺术的本质就在于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通过形象传达给别人；正如普列哈诺夫所说，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说艺术在形象地传达作者思想的同时，也传达作者同这思想相联系的感情，艺术作品不但以其深刻的思想使读者受到教育，同时也以其热烈的感情使读者受到感染，那就是正确的了。具有热烈的感情，是艺术有别于科学的特点之一。虽然如此，但艺术还是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感情，是由理性所决定，并为理性所统驭；在语言艺术中，又是为理性的东西——语言的词、句——所表现的。读者受到作品感情的感染，也是通过对作品文字的理解而得到的。只有把感情与理性结合起来，并且把理性放在第一位，才能正确地说明感情对艺术的意义。否则，把两者割裂开来，反对理性，片面地强调感情的作用，如李泽厚同志所说的“情感愈真愈强，就愈有反映的能力……”^③就会变成狐仙堂上的牌匾：“诚则灵”，而走向极端唯心主义的感应论！

总之，形象思维论这种所谓不要概念、不用抽象、不依逻辑、从形象到形象就可以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2页。

② 《书评》。《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5页。

③ 《试论形象思维》。1959年第2期《文学评论》，第108页。



认识事物本质的认识论，显然是一种直觉主义因而也是神秘主义的体系。这种所谓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说明文艺创作不容代替的科学理论

文艺作家的认识和创作活动，是绝不能脱离毛泽东同志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的。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又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名言，对文艺的本质和文艺创作作了科学的说明，是我们理解文艺问题的根本依据。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文艺领域中的重要发挥。因此，必须从思想和存在的辩证同一性即由物质到精

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辩证转化的原理出发，才能从根本上理解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问题的上述科学论述，正确地解释作家的认识和思维活动。下面我们就结合叙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阐明这些问题。

大家知道，人们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使人们的头脑和外界物质环境发生联系的，则是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认识来源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客观世界的森罗万象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形成感觉和知觉。感觉是对于客观对象的个别属性（例如它的颜色、气味、冷热等等）的反映，而知觉则反映着一个客观事物的互相联系的属性的总和。感觉和知觉是物质世界的直接反映，它总是具体地反映着物质客体的具体特性。例如，它反映的不是一般的颜色，而是某一个物体在某种条件下的某种颜色；不是一般的重量，而是在某种条件下某一物体的重量等等。感觉和知觉，是人类认识的基础。

由于人脑有记忆能力，人们通过感觉和知觉获得了外界某个事物的映象之后，就在没有这个具体事物引起人们的感觉得时，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可以出现这个事物的具体形象。这种在人的记忆中复现出来的形象，叫做表象（即印象）。表象是过去知觉的再生，它大致地反映出客观事物的轮廓。感觉、知觉、表象都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它们只能反映事物的现象，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863页。



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①而记忆，则是人们进行思维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表象材料积累多了，经过多次的反复和比较，分析和综合（把许多事物的表象加以分解，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的东西），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形成概念。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它已经超越了对具体事物的直观，而进入了理性认识的领域，即思想的领域。概念是由对具体事物的分析、概括而产生的，它又为人们进一步进行分析和概括提供了可能。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就可以做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步步深入地揭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这样，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感觉、知觉、表象而发展到概念，再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过程。

由此可见，思想同样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它不是以感觉、知觉、表象的形式，而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反映客观存在的。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事物的具体形象，而是事物中共同的东西：它们的本质，它们内在的联系和固有的规律性。因此，人们在进行思维时，就必然要越过具体事物的感性形象，对感觉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如果停留和执着于事物的具体形象，思维就是不可能的。当黑格尔谈到“抽象着的思维却是扬弃了感性材料并把它这种简单现象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西”时，列宁批注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他着重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是认识真理的必经之路。^②这就说明：形象思维论者所说的那种不扬弃感性材料、不脱离感性形象而能认识事物本质的形象思维，是根本没有的。这是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概念毕竟是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和概括出来的，它和事物的一部分属性是紧密联系着的；即使是经过多次判断和推理而达到的高度抽象的东西，看起来与感性的东西相离很远，但它还是植根于感性的东西的。列宁指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是现象中巩固的（保存着的）东西”；又说：“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相互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③这就是说，一切本质都要通过具体的过程、关系、现象等等表现出来，不表现为任何现象的本质是没有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③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9、158、278页。



的。因此，在思维中，只要这概念是人们自己对具体事物进行概括而得到的；或者他从别处得到某个概念后，经过自己对实际生活的体验，是充分了解这一概念和具体生活的联系的，那末，当需要的时候，人们就能够从概念再回到感性形象上来。可见，形象思维论者以为人们只要用概念思维，形象便一去不返，概念就不能返过来体现为感性形象，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人们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否正确，也必须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检证。在物质到精神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经过感觉映入人们的头脑而成为表象，再由表象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思想；在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中，这种思想转过来又成为人们实践的依据和指导。在实践中，由于发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或其他原因，人们常常需要部分地以至全部地改变原来的思想和计划，但是，改变了原来的思想和计划，又产生了新的思想和计划，所以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自觉目的的活动。这正是人类的特点。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①。可见，形象思维论者否定作家创作时先有主题思想，是不合乎人类活动的规律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劳动中，就需要从一定的思想认识出发，通过创造性的想象，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相应的表象，再根据这个表象改变物质的形态，

即进行新的创造。马克思说：“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还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是，使最拙劣的建筑师和最巧妙的蜜蜂相比显得优越的，自始就是这个事实：建筑师在以蜂蜡构成蜂房以前，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把它构成。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已经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所以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②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劳动过程开始时劳动产品在人的头脑中的观念形态的存在，就是劳动者的思想复现而成的表象。这样，人们由一定的思想出发，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取得和自己思想一致的新创造的表象，再依据这个表象来制造产品，改造世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过程。

由此可见，表象是由物质到思想所必经的中间环节，同样也是由思想到物质所必经的中间环节。在由物质到思想的过程中，正因为客观物质经过感觉进入人们的意识中成为表象，人们才有可能对诸多感性的形象进行分析、比较、综合、概括，取得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在思想到物质的过程中，又正因为表象材料可以经过抽象而变成思想，人们就可以把表象材料经过抽象而同自己的思想意图彼此比较，反复衡量，然后用它们在头脑中建立起和自己思想意图相一致的形象，根据它来制造器物、改造世界。思想和

① 《自然辩证法》，第145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172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存在的辩证同一性，在意识中就表现为概念（或思想）和表象的辩证同一性。从存在到思想、从思想到存在那种互相转化是在实践基础上，经过人们意识中从表象到概念、从概念到表象这种互相转化之后才能实现的。这也就是说，用思想指导实践来改造世界，是必须以由思想转化而成的新的表象作样板的。

由物质到思想和由思想到物质虽然都以表象为中介，但是这两个阶段的表象的性质却是不相同的。前一个阶段中的表象，是已有的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映象的再现。这是理性认识的前行步骤，是属于感性认识阶段的。后一个阶段的表象，则是由人的思想意图转化而成的，它是新创造的产品在创造者观念中的模型，是理性认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感性体现。第一阶段的表象的出现是由于人的形象记忆，而第二阶段的表象的产生，则是依据人们的思想意图进行创造性想象的结果。工程师的蓝图，是新的物质产品的样板，文艺作品则是供人阅读和欣赏，对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作用的。这两者对客观世界实现改造的方式不同，但就思维过程来说，**艺术形象也是人们头脑中第二阶段的表象，是由作家用一定的艺术手段描绘出来的第二阶段的表象。**创造性想象是人所共有的。文艺作家在头脑中所以能够塑造形象，正是因为他和一般人一样，能够进行这种创造性的想象。

高尔基讲过：“想象，在本质上，也是关于世界的思维。不过它特别是凭借形象的思维，是‘艺术的’思维。想象，可以说是一种甚至能给与自然的自发现象和事物以人的性质、感觉和意图的能力。”^①有些形象思维论者就以这样的含糊语句为依据，把创造性想

象说成是一种作家特有的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而反对思维中运用抽象。这同样是徒然的。前边已经论证过：人们的思维必须经过抽象才能进行，所以，创造性想象绝不是什么不用抽象而用形象来进行的思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抽象思维，创造性想象才成为可能的。

创造性想象，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思想意图，从头脑中贮存的客观事物的表象材料中选择相应的部分，予以适当的加工组合，构成新的表象的一种意识活动，也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思想意图去“想”与之相适应的“象”。人们的思想意图是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经过感觉再经过抽象的思维形成的，它属于理性的范畴。而人们头脑中的表象材料，却是感性的东西。如果不对这些感性的东西加以分析和抽象，认识它们的性能和意义，那末，这些表象材料就不能同人的思想意图挂起钩来。可见，文艺作家头脑中新的表象的创造，必须是一个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循环往复的思维过程。这和形象思维论者的不经抽象、“从具体到具体”的主张，是有原则的区别的。简言之，人们（包括作家）所以能够运用想象在头脑中创造出新的形象，是因为有第一阶段客观事物的表象的基础，有抽象的思维的中介即有理性认识的指导。正因为从生活中的形象到艺术中的形象是以把握事物本质的抽象的思维为中介，艺术形象才能

① 转引自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社1949年版，第76页。高尔基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要创造典型，必须先把某一社会集团的本质特征抽象化，然后再把这特征具体化于一个人物身上。参看同书第102页。



比普通实际生活中的形象“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也正因为如此，革命的文艺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①如果认为没有第一阶段客观事物的表象，就可以产生第二阶段的创造性表象，——在文艺创作中，如果认为离开社会生活的源泉，也可以凭空创造艺术形象，那便是唯心主义。但是如果认为没有抽象的思维的中介，第一阶段的表象就可以直接变为第二阶段的创造性表象，如形象思维论者所主张的那样，那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

“形象大于思想”——这是好多形象思维论者反对思想和形象的辩证同一性，论证作家创作是从形象到形象，抹杀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坚持主张形象思维论的重要根据之一。这是形象思维论者昧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表现。前边说过，从表象到概念的飞跃，就是经过抽象的，就是把许多不同事物的某些属性舍去，概括其相同属性的结果；而在从概念到新的表象的转化中，人们又必须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回到体现这个概念的新的事物的形象上来，因为这是事物的具体形象，所以它就同时也具有别种属性。能够因为这种情况而否定思想和形象互相转化的辩证同一性吗？其实，概念和形象就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一个概念包涵着若干形象的这种同一属性，一个形象又具有包括这共有属性在内的若干个不同的属性。列宁说：“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

物。”^②就概念是形象的“一部分”来说，形象大于思想；就概念“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来说，思想又大于形象。所以，同一主题，可以用不同的形象来表现。例如，给画家们出一个题目，使他们各不相谋，独自构思，就会画出不同的画面来。反过来，作家依据一定的主题思想创作出的作品，因为它是具体的形象，所以，除了主要的表现这个主题思想之外，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时，还可能发现另外的意义。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在文艺领域中存在，而是认识和创造中的普遍现象。但就创造者来说，他所以塑造这样的形象，正是因为这个形象同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形象，是由创造者的一定的思想转化而成的；形象思维论者认为作家可以创造出根本违反自己思想倾向的作品，是非常荒谬的。

总之，形象和概念，是辩证的同一关系，它们往返转化。否认了这一点，也就相应地否认了物质和精神或存在和思想的辩证同一性。

根据上面的论述，作家创作的总的思维过程是：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就是：个别（众多的）——一般——典型。当然，不论从表象到概念或者从概念到新的表象的转化，都不是直线进行、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辩证的、多次循环往复的过程。但这里有一点必须充分明确：作家的思维和一般人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一样，必须经过抽象才能进行，也只有经过抽象，人们才能得到理性认识。作家的理性认识是在实践中经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研究才形成的，但它返转头来又成为作家创作工作的统帅，作品形象的灵魂；文艺作品正是作家这样形成的一定的理性认识的形象体现。否认了这种理性认识的中介，就是否定了文艺作品的创造性，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指导的可能性，反对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倾向性。

文艺创作是进行阶级斗争，改造人、改造社会的武器。革命的文艺作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必须投身于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之中，从这唯一最广大的源泉中汲取丰富的“原始材料”，获得对于社会生活的感性知识；又必须对这种“原始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即经过科学的抽象，把握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的本质，达到理性认识，才能贯彻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创造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文艺作品，有效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五、从形象思维论的演变 看它到底为什么人服务

为了了解形象思维论到底为什么阶级服务，考察一下形象思维论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直觉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基础之一。像我国过去一些资产阶级美学家宣扬的克罗齐的理论，就是以直觉主义为基础的。但现在我国流行的形象思维论，却是从苏联某些文艺集团搬来的。苏联现代的形象思维

论者在论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一般都援引别林斯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一年写的题为《艺术思想》的没有写完的论文中，给艺术下了一个定义：“艺术是对于真实的直接观照，或者是形象中的思维（Мышление в образах）。”^①在另一些文章中，他还常用“用形象来思考”（Мыслить образами）的提法。传到我国后被译成“形象思维”。在《艺术思想》这篇文章中，别林斯基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质，都是自我思考、自我发展着的思维。思维体现于人，有三个发展阶段，构成三种方式：宗教的、艺术的和最高最后的纯思维（即哲学）。所以艺术乃是自我发展着的思维在人身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思维外化为形象，因而形象中的思维就是艺术的本质。别林斯基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定义，并不是他的发明。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谈到艺术的实质时说：“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作品“是概念从它自身出发的发展，是概念到感性事物的异化”；“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表现理念，以供直接观照”^②等等。别林斯基的艺术定义正是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里引来的。至于艺术家“用形象来思考”的提法，却是别林斯基从黑格尔的观点中引伸出来的。

黑格尔对于艺术的本质的论述，是从他的所谓绝对理念出发的，因而是唯心主义的，

① 《别林斯基论文学》，别列金娜选辑，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 《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14、65、86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但是其中也含有辩证的合理的因素。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角度说明了概念和形象的辩证同一性。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一辩证的思想，在当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从概念和形象的辩证同一性的原理出发，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说明了艺术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论证了典型是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等等。但是，别林斯基同时也引伸和发展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因而在他的艺术观中又充满了许多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糊涂思想。一方面，他不能科学地了解思想的来源，不懂得从客观存在到思想的转化。他认为构成艺术内容的思想，“就是那永恒的、在自由的必然性中辩证发展着的思想”，“它不是通过理性、而是直接地”出现；而“诗人创作活动的源泉是从他的个性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①。另一方面，他也不了解思想如何转化为形象。他说：“连艺术家自己也往往不明白，一篇新作品的胚胎怎样会落到他的心上的，他怀着这‘诗的思想’的种子，有如在母亲的子宫里怀着胎儿一样。”^②他把思想到形象的转化归结为艺术家的天赋，天性赋与艺术家“一种直接的能力”，使他“能以形象思考、判断”，“能通过情感、以诗的方式获得现实的印象，并且能通过幻想的活动，在诗的形象中去复制这些印象。”^③上述这些，又是别林斯基艺术思想中消极的一面。

在思想战线上，对遗产的继承，从来就是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密切联系着的。无产阶级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建设科学的文艺理论的材料；而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则要弃其精华，取其糟粕，作为

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武器。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文艺界和理论界虽然也有一些人谈论形象思维，但其解释是各不相同的。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文艺界掀起了一个所谓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逆流。一些人打着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幌子，实际上是要反对文艺的倾向性，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些人便从别林斯基的著作中抬出“形象思维”的论点，攫取其中消极的错误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意思大加发挥，并且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把它装饰起来，使之成为所谓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实际上是在文艺领域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武器。

现代形象思维论的一个代表作，就是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三年第五期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论艺术文学的特征》。她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形象思维’是艺术特征的定義的中心。”但别林斯基这个定义被人们作了“错误解释”，因此必须“为正确理解形象、形象思维的实质而斗争”，并且把这个“真正科学的原理”向前“发展和精益求精”。她认为：“逻辑思维 and 形象思维是反映现实的统一过程的不同形式”，两者“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其本质却是完全不同的”。文章在总结形象思维的特征时指出：“在形象思维中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的揭示、概括是与对具体的、富有感染力的细节的选择和集中同时进行的。”从这个公式出发，尼古拉耶娃反对作家在思维中应

①②③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 27、9、138、52、13、11 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用逻辑和抽象，认为文艺作品所以发生公式化和概念化，就是因为“在创作的一定阶段上用逻辑思维代替了形象思维。”^①尼古拉耶娃在她的文章中口口声声地宣称：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用列宁的反映论原则，反对非理性主义等等，但是，由于她反对在文艺创作的思维中运用逻辑和抽象，就在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修正了列宁的反映论，宣扬了非理性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子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修正主义的特色。

一九五五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十八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的专论断言：“对生活作艺术的认识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这种规律同科学认识的规律在许多方面是很不同的。”^②它指出，同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情况不同，一定的党性立场和政治观点在艺术认识中并不是揭示现实本质的必要条件。专论援引巴尔扎克为例证，认为即使是政治上反动的作者，也能写出进步的作品。这个专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形象思维的问题，但在总的倾向上支持了形象思维论。一九五八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该杂志编委伊凡诺夫的论文：《谈谈艺术的特征》。这篇文章对形象思维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说：“虽然人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最终可以归结为两种区别最大的形式——科学的形式和艺术的形式。实质上，可以把它们确定为人的两种认识能力。每个人都有这两种认识能力。不过，有的人用概念思维的能力强些，有的人用具体画面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强些。”“艺术的实质恰恰可以规定为这样一种认识形

式：从现实现象的具体感性面貌中再现现实现象。而这就是形象思维。”^③后来，形象思维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的支持下，在苏联的地位就进一步巩固起来，并且还被一些人称为“伟大的真理”。

考察了形象思维论在苏联演变和流行的过程，我们就能够明白：别林斯基从黑格尔那里引来的关于“艺术是形象中的思维”这个论点，在今天的苏联忽然被人们从消极方面加以发挥，并且大走红运，原来是出于修正主义者的需要。修正主义者在文艺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多方面进行的，而形象思维论则是从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进行修正的，它的作用就是要在文艺理论中挖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基，使文艺成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以便于他们在其中兴妖作怪。很显然，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文艺界逐步流行起来的形象思维论，正是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形象思维这个观点传入我国后，曾被胡风拿来进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所作的《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甚么？》一文中说：“文学创造形象，因而作家底认识作用是形象的思维。并不是先有概念再‘化’成形象，而是在可感的形象的状态上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他狂妄地向作家发出号召说：“要使艺术（文学）成为

① 以上引文见《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4年版，第145、146、147、160、182页。

② 《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7年版，第107页。

③ 1958年第6期《学习译丛》，第30、32页。



艺术（文学），要使艺术（文学）取得它应有的威力，作家就应该有毅力从‘逻辑公式的平面上’跨过。”^①一九五一年，胡风在为他的反党论文《论现实主义的路》所作的后记中宣布，作为本书的续篇，他准备写一篇《论形象的思维》的文章。胡风这篇文章没有写成，但从他后来以意见书的形式提出的反党文艺纲领中强调所谓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的指导作用等等，就已经可以看出，他所预定要写的“论形象的思维”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后来，胡风的反党阴谋被粉碎了，但是他的形象思维的论点并没有得到批判。这时尼古拉耶娃的文章已经被翻译过来，并由出版者以十分推崇的态度推荐给我国文艺界。一九五五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专论的发表，标志着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在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文艺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来继续以形象思维论为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开火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当时的《文艺报》编委、后来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陈涌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搬运尼古拉耶娃的论点，并且援引上述《共产党人》专论中关于文艺有其特殊规律的话，公然反对把《实践论》的思想用于文艺创作，反对应用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认识的阶段论的原理来说明作家的思维过程，诬蔑这种应用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的公式”；从艺术本质和作家思维的根本问题上，为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制造论据。右派分子周勃于同年八月份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

《略谈形象思维》一文对这一点就说得更加露骨。他还依据所谓形象思维的规律，公然向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挑战，宣称：把作家的创作过程表述为这样一种公式——“作家经过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以后，获得了理性认识，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是非常有害的”^②。在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对陈涌、周勃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了斗争，但是对他们用来向党进攻的理论武器——形象思维论——却没有触动。当时虽然有个别同志曾经对形象思维论提出批评，但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反而遭到一些人的反驳。在他们看来，形象思维论既然是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所肯定了的，因而也就是毋庸置疑的。另外有些同志认为，用形象思维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指导作用是错的，但形象思维论本身并不错；只有形象思维才能说明文艺创作的特点。这样，人们的出发点不同，而结果却是一个：都肯定了形象思维论。从而，形象思维论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广泛地被采用在我们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和大学的文学课程中，成为文艺创作的一个认识论基础了。

六、结 语

上面的论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说的话：现代形象思维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这个体系，为作家的思维编造了一个“从具体到具体、从形象

① 《剑·文艺·人民》，泥土社1953年第3版，第155—156、149页。

② 1956年8月号《长江文艺》，第41页。



到形象”的特殊公式，不允许抽象思维或概念“插在中间”，这就使一切理性思想在作家的头脑中毫无立足之地，从而在文艺创作领域中否定了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的可能性，也使文艺批评成为白费。这个反科学的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理论的传播，只能麻痹作家的理性，阻窒作家的自觉，使文艺创作在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自发地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显然，形象思维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听信形象思维论，那么，不管我们在文艺创作方面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都会被它勾销得干干净净。显然，不彻底打破形象思维论，就在文艺领域中讲不清道理，从而也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各种错误倾向。

形象思维论在我国所以如此流行，正是由于它是从苏联搬来的。像克罗齐之流的赤裸裸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论，在我国革命的文艺运动中从来就没有合法地位，建国以来又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批判。而来自苏联的形象思维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许多主张形象思维论的同志，正是受了蒙蔽，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来接受的。而一些混进我们阵营的别有用心的人和受了资产阶级影响而蜕化变质的人，则乘机利用形象思维大做文章，进行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我们必须进行分析，既不能因形象思维论是个修正主义理论而把一些受人欺骗、曾经主张或宣扬形象思维论的同志说成修正主义者；同时又必须如实指出形象思维论的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实质，以便人们认清它的危害，同它划

清界限。

就被欺骗的同志来说，他们所以接受欺骗，从认识方面来说，是由于他们对文艺的形象性作了形而上学的理解，没有理解思想与形象的辩证同一性。从精神状态方面来说，则是由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对国外一些文艺家的“理论”，存在着很深的迷信。他们不去研究这些理论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即使有时发现这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抵触，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这些“理论”，而是企图把两者调和起来。

我国形象思维论者的错误，从反面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我们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科学的文艺理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是我们从根本上说明文艺创作的科学根据。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以及他对文艺工作的各项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我们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于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遗产进行科学的鉴别，把当代文艺战线上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扫清文艺领域里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妖氛迷雾，并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但是把这个任务明确地提到文艺界的日程上来，并且着手去做，已经是时候了！

（一九六三年二月初稿，一九六四年十

月修订，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次修订）



工农兵诗选

人把毛主席著作比太阳

梅茂亭

人把毛主席著作比太阳，
我说太阳比不上；
太阳上山又下山，
毛主席著作日夜放光芒。

战士最爱毛主席的书

薛治本

世界上书籍千千万，
毛主席的书战士最爱念。
篇篇文章是真理，
字字句句金不换。

一天不看毛主席的书，
饭到嘴里无油盐。
天天都念毛主席的书，
一颗红心永不变！

（摘自1966年3月31日《解放军报》）

不靠神仙不靠天

殷光兰

不靠神仙不靠天，
集体力量大无边，
毛主席带着咱办公社，
换地又改天！

晨 读

郭国栋

早晨，
勘察队员散坐在帐篷旁，
吸着清新的空气，
阅读毛主席的文章。

一句……一滴雨露，
滋润人们的思想；
一篇……一阵春风，
吹开心灵的门窗。

身在江边，
胸中翻腾着五大洲的风浪；
脚踏高山，
双手描绘着共产主义的图样。

满怀激情读着智慧的文章，
越读越觉眼明心亮，
字里行间充满着真理，
给人们增添力量。

太阳照耀着山头的白云，
露珠在青草上闪光；
勘察队员捧着毛主席著作，
要把真理的阶梯攀上。

